

我国翻译教材建设反思:现状、问题与对策*

东莞理工学院 龙晶晶 暨南大学 官 齐

摘 要 本文系统梳理了国内现有翻译教材的现状,以此为基础指出翻译教材建设的突出问题。针对现存问题,必须重点考虑现实需求,创新教材内容形式,推动翻译教材科学管理,建立完善审查监管机制,发挥思政价值,并通过开发翻译术语数据库,促进在线资源有效共享,从而在根本上推动我国翻译教材建设发展。

关键词 翻译教材建设 问题 对策 语言服务

中图分类号 H319.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795(2023)01-0093-0007

外语教材研究

1 引言

自 2006 年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河北师范大学试点开办翻译本科专业以来,经历了近 20 年的建设,时至今日翻译专业在国内的高等教育体系中渐趋于成熟,如今已形成了高职高专、本科硕博的多层次高等教育体系,但现阶段在学科专业定位、人才培养目标和模式、教材建设、课程设置、师资队伍等方面仍存在诸多不足(贺爱军、尤其达, 2009)。在翻译教材建设方面,随着高水平大学建设的不断推进,中国翻译事业迎来了历史发展的新时期,翻译人才队伍是增强国家翻译能力、构建中国话语和叙事体系的基础支撑(杜占元, 2022)。翻译教材作为翻译教学活动正常开展的重要依托,是加强高质量翻译人才培养和提升当代译者综合素养的关键所在。高质量且适合社会发展需求的翻译教材能全面推动翻译学科整体发展,能有效促进形成“教材—学科”互动发展的良性生态循环,更新学科教学观念,从而适应我国新时期对翻译人才的旺盛需求(何刚强, 2013)。此外,随着《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多语种版本进高校、进教材、进课堂(“三进”)工作的开展,翻译教材的思政功能也日益凸显,其目标便是强化培养过程,打牢基础,为未来培养优秀的翻译人才服务。

但是,目前纵观国内现行翻译教材的编写和出版,各类教材泥沙俱下,存在诸多乱象,如教材编目混乱、课本内容片面、层次不清、理论脱离实践等,翻译教材相关研究亟需深入探讨。本文将系统梳理国内翻译教材建设的现状,透视现存教材背后存在的问题,并据此提出相关解决方案,以期国内翻译教学研究、翻译教

材编撰与修订提供建议,为培养高质量翻译人才提供优质学习资源,旨在推动翻译教学与翻译实践的共生进步,反哺翻译学科建设。

2 教材与翻译教材

翻译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其教材建设是核心,它承担着传递课程理念、表达课程内容的使命(陶友兰, 2017)。教材作为课堂教学的基础教学资源之一,不仅影响教学计划能否有序实施,更决定着教学质量的高低。

对于教材的定义,学界尚未统一说法,如《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部, 1985)关于“教材”的定义有两种:“一是根据一定的学科任务,编选和组织具有一定范围和深度的知识与技能的体系,它一般以教科书的形式具体反映;二是教师指导学生的一切教学资料,包括教科书、讲义、教学提纲、参考书、辅导材料。教科书、讲义与教授提纲是教材整体中的主体部分。”《教育大辞典》(上)(顾明远, 1998)将教材定义为:“教材是教师和学生据以进行教学活动的材料,教学的主要媒体,通常按照课程标准(或教学大纲)的规定,分学科门类与年级顺序编辑,包括文字教材(如教科书、讲义、教授提纲、图表与教学参考书等)和视听教材。”《现代汉语词典》(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部, 2002)则将“教材”定义为:“有关授课内容的材料,如书籍、讲义、图片、讲授提纲等”。除了词典定义以外,很多教育学家也尝试对“教材”进行界定,如廖哲勋、田慧生(2003)认为,“教材”是“以一定育人目标、学习内容与一定学习方式为基础成分而分门别类组成的提供给学生

★ 版权所有 文责自负 ★

认识世界的规范化、程序化、具体化的育人媒介”。从上述定义可知,教材的定义随着教材存续形式的变化而调整,然而其核心要义与外延并无改变——教材是一种教学资源,适用对象为学生。

然而,何为翻译教材?国内学者对此众说纷纭,如方梦之(2011)指出,翻译教材是“以培养和提高翻译技能为主旨、有较为清晰的以教学为导向的编撰线索、用于翻译课教学的教程”;何刚强(2013)指出,翻译教材是为外语学科开设翻译课而专门编写的,可分为翻译实践类教材、翻译理论类教材、翻译技术类教材等类型。究其根本,翻译教材是为翻译专业学生专门编写的教学资源,主要涉及翻译基础原理、翻译实践技巧、翻译理论知识等内容,面向各层次学生群体,由国内外出版的著作。此外,按照翻译形式,可分为面向口译、笔译的教材等;按照专业方向和用途,可分为医学翻译、法律翻译、财经翻译、典籍翻译等。

随着近年来“一带一路”的不断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集体“走出”国门,翻译研究与翻译教材出版迎来了良机。翻译教材的建设事关如何培养高质量翻译人才,发挥好翻译在国际交流中的“桥梁”功用,更加生动地讲好中国故事,从而更好地推动中华文化走向全球。

据不完全统计,2000年后出版的翻译教材逾1000种。然而,目前市面上各类教材种类繁多,质量参差不齐,学界对此缺乏细粒度的梳理与总结,将其笼统归类为“翻译教材问题”。目前翻译教材问题大致包含若干子问题,如翻译教材建设、翻译教材使用、翻译教材音译、翻译教材术语等问题。以“翻译教材问题”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进行检索,得到的相关结果多为“翻译教材建设问题”“翻译教材编写问题”。张美芳(2015)、陶友兰(2017)、张巍然(2018)等对此进行了探讨,可见目前翻译教材问题的焦点是翻译教材建设。

国内对于翻译教材建设的系统性研究较为匮乏,究其原因是学界对目前市面流通的教材缺少系统性的回顾,难以掌握市场真实动态,产出的研究难以切中使用者的难点和痛点,缺乏对现有翻译教材的全面回顾与梳理,不利于产出高质量翻译教材,阻碍了翻译专业人才培养。因此,有必要重新系统考察国内翻译教材建设现状,综合评估现状,从而提出针对性改革措施。

3 国内翻译教材建设现状考察

翻译教材是落实翻译专业教学目的和大纲的载体,是翻译专业学生了解与掌握翻译理论、实践、技术

等方面专业知识的重要途径。进入21世纪后,随着翻译和翻译研究重要地位的凸显,以及翻译学学科建设的逐步形成,学界对翻译教材的重视度也不断提高,并就此开展了一系列积极的探索,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研究方法和理论也形成了多元化发展的趋势。总体来看,国内翻译教材相关研究的整体脉络较为清晰,以下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探讨。

3.1 翻译教材整体性研究

关于翻译教材整体性研究方面,国内已有较多学者对此进行了探讨,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批判性吸收国外翻译理论,提高本土译论在教材中的比重、避免国内译论产生“失语症”(刘季春,2001;陶友兰,2015等)。也有学者针对国内高校翻译教材现状展开了讨论,主要集中在批判现有教材以及提出设计理念(孙启勤,2008;郑艳杰,2013;苗宁,2014;张巍然,2018;肖维青等,2021)。上述学者对翻译教材整体性研究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其探明的弊病及解决方案具有前瞻性,为翻译教材的后续建设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然而,这些研究往往以单样本或个例作为研究对象,鲜有学者对自建国以来,特别是70年代以来的翻译教材进行全面梳理,并提出具体可行的建议,缺乏对翻译教材的整体把握。

3.2 专门用途翻译教材研究

近年来,专业翻译教材编写有了较大的发展,大量专门用途的翻译教材(如医学翻译、法律翻译、财经翻译等教材)相继出版。就此许多学者研究了国内专门用途的翻译教材建设情况。一些学者聚焦于专业性、应用性强的专门用途翻译教材,如服装英语翻译、冶金英语翻译以及典籍英语翻译等(王宏、付瑛瑛,2009;刘娟,2018;李忠霞、王素雅,2021;单宇、何苗,2021等)。也有研究聚焦英语专业学生所用教材的研究,如顾维勇(2007)、岳峰(2017)等。此外,国内还出现了我国第一本以搜索为主题内容的翻译实用教程——《翻译与搜索教程》(张成智,2022),以及王华树等(2022)编写的《翻译搜索指南》。此类教材均强调搜索已成为翻译能力的重要元素,并论述了搜索在翻译中的重要作用以及翻译中常用的各类搜索手段,是极少数旨在培养翻译人才具体翻译能力的新型翻译教材,具有里程碑意义。

综上所述,尽管上述学者指明了国内翻译教材的现存问题,但相关研究的广度与深度仍存在进一步拓宽的空间,没有深入探讨这些问题的可行措施,难以触及翻译教材建设的痛点与难点。本文通过关键词检索

法,在图书网站“读秀”“全国图书馆参考咨询联盟”“卓越网”“当当网”等输入相应关键词(如“翻译教材”“翻译理论”“翻译概论”“翻译通论”以及“翻译教程”)进行了检索,共检索到 1272 种教材,并记录了作者、出版年份、出版社以及简介等信息。笔者以十年为时间跨度对 1970—2022 年间的翻译教材数量进行了统计,结果见图 1^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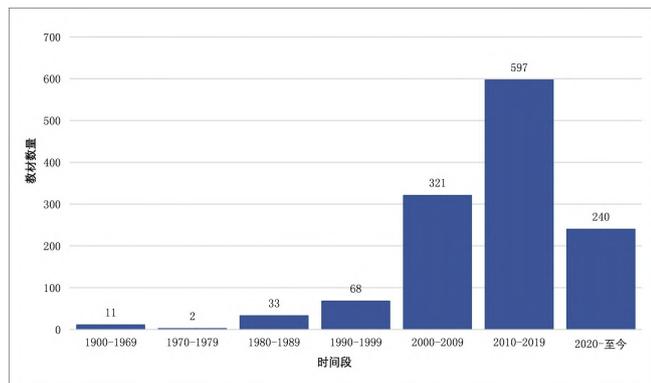


图1 1970—2022年的翻译教材数量变化

本文以 1970 年为起点,大致将半个世纪以来的教材出版分为三个阶段:(1)1970—1989 年为第一阶段;(2)1990—2009 年为第二阶段;(3)2010 年至今为第三阶段。总体而言,国内翻译教材的数量自 20 世纪 80 年代起呈现出陡然增长的局面,这意味着国内翻译事业自 20 世纪 80 年代起进入繁荣发展局面。

1970 年之前,国内翻译教材数量极少,翻译教材建设大多数时间处于停滞阶段。在此期间,出现了颜惠庆编写的《华英翻译捷诀》、蒋冀振编写的《翻译学通论》、吴献书编写的《英文翻译的理论与实际》、费道罗夫编写的《翻译理论概要》、陆殿扬编写的《英汉翻译理论与技巧》、耿龙明和陆兆泉编写的《翻译教材》以及编写于 1960—1969 年间的两本教材,翻译教材建设尚未起步。

1970 年以后,国内的翻译教材数量稳步增长,至 1989 年时,新增 33 本翻译教材。自 1990 年以来,国内翻译教材数量呈现出稳步上升的趋势,至 1999 年共新增 68 本翻译教材。2000—2009 年共新增 321 本翻译教材。2010—2019 年达到新高,新增数量近乎翻倍,达到 597 本。这一增长态势也表明国内开始重点关注翻译教材建设,这离不开国内语言服务行业对于语言服务人才的旺盛需求、翻译专业的开设以及翻译专业本科生数量的增长。随着《翻译专业本科教学指南》(以下简称《指南》)的公布与《理解当代中国》各

语种系列翻译教材的问世,2020—2022 年翻译教材数量迎来一个爆发阶段,前三年的新增量已接近过去十年总增量的一半,这表明《指南》以新标准、新需求推动教材精品化,淘汰了一批内容陈旧、编排不合理、存在较多漏洞的低质量教材。

从编写内容方面来看,翻译理论讲解、翻译技巧以及相关的翻译实践案例是大多数翻译教材的内容,且多数教材中的实践内容陈旧滞后,与实际脱节,部分理论术语的翻译也存在一定问题。从出版社方面来看,部分书籍的出版机构较为混乱,而且部分出版物的质量也存在较大问题,这与出版社把关不严有重要关联。出版社作为进行有版权物品的出版活动的组织,有责任及时处理并寻求应对之策,促使国内翻译教材向数字化、多媒体融合化方向转变。

此外,书籍的总被引用量可以反映书籍的影响力以及整体质量。通过从“读秀网”检索的教材被引用量情况可知(如图 2 所示),国内翻译教材总被引用较高的书籍较少,多数翻译教材引用量不高。此外,由于其检索机制限制,检索结果较难区分教材与教辅,因此本结果仅作参考。

总被引用量在 2000 以上的教材仅有九本;总被引用量在 1000~2000 的教材有 22 本,在 101~200 以及 201~300 的分别是 41 本和 19 本,其他范围内的参数都相对较低。有 611 本教材出版许久,但其总被引用量却是零(如图 2 所示)。这说明这些教材自出版后阅读量较小,出版机构应避免低水平翻译教材的出版与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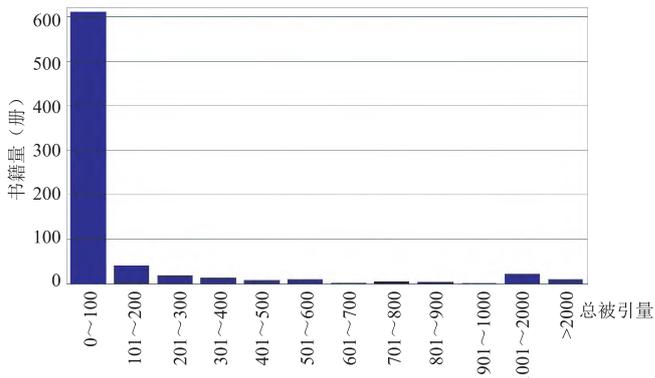


图2 翻译教材总被引量图

① 由于 1970 年前共计出版 11 部,数量极少,故本研究主要讨论近半个世纪翻译教材的建设情况。其中 1900—1909 年、1920—1929 年、1930—1939 年各一部,1950—1959 年五部,1960—1969 年三部,其余年代无翻译教材出版。

4 存在问题与分析

通过对国内翻译教材的数量、内容、效果反馈等的分析,发现国内翻译教材在内容编排、针对群体、存续形式、核心理念等方面存在部分问题。

4.1 编排固化,内容陈旧,脱离实际需求

新时代以来,“翻译进入职业化和专业化时代,面临着人工智能和翻译技术的挑战,成为语言服务行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陶友兰,2017)。翻译专业应当“以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内容为翻译内容,以口译和笔译或机器翻译等为翻译形式,面向文化多样性、经济一体化、信息全球化的语境,培养具有国际视野、人文素养、创新能力的专业化翻译人才及语言服务人才”(仲伟合,2021)。自2019年《指南》发布以来,翻译技术尤其是计算机辅助翻译技术以及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更是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肖维青、冯庆华,2019)。《指南》中翻译技术的培养目标为“帮助学生了解翻译技术的特点、分类和发展趋势,培养学生运用各种翻译技术和工具的能力,提高学生的翻译技术素养,为其将来从事相关职业和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教育部高等学校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英语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2019)。

对现有教材内容的分析显示,首先,大部分翻译教材的内容设置相对保守,流于表面,仅收录了传统翻译学理论流派的相关成果或是单纯叙述具体翻译技巧,内容相对枯燥陈旧;缺少翻译技术相关内容与最新动态,既无常用的CAT(计算机辅助翻译技术)工具(如SDL Trados、MemoQ、Déjà Vu等),也无Tmxmall等新兴在线翻译对齐平台的介绍,同时也未提及基于虚拟现实的口译教学平台,总体上难以满足《指南》对翻译技术素养提出的要求。其次,翻译技术与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深度结合后,对翻译市场实景产生了深刻影响,对译员群体产生了全新要求。因此,运用传统译论指导翻译实践已经无法适应当前的翻译市场需求,翻译理论应该深入探讨翻译实践状况,捕捉市场动态,相应加入对现代译员综合信息技术素养的探讨,推动“理论—实践”相互良性发展。随着高质量翻译软件的盛行,译后编辑成为现实译员的真实工作形式,传统理论描述难以适配当代翻译实践形态。现阶段国内翻译教材的理论描述和实践指导存在较严重的脱节。

这些教材在内容的编排方式方面也较为固化,其中多数为纸质书籍,缺少配套音视频、网页、PPT或电子版书籍等多媒体、数字资源,缺少对新兴信息数字技

术的适配。新时代对高素质翻译人才的要求决定了创新翻译教材编排形式的必要性,新的教材应当拓宽知识领域,促使其向数字化、多媒体化转变,提高教学效率和人才培养质量。

此外,翻译学科可分为口译和笔译,教材使用者也可分为不同年级的高校学生和翻译业余爱好者,其需求也不尽相同。因此,翻译教材应满足学科发展、人才培养、市场发展等不同维度的需求。

4.2 本土译论患上“失语症”,思政育人功能亟待重视

国内多数翻译教材均存在重视外国翻译理论而忽略本土创新成果的现象。由于翻译学科主要发轫于西方,编者在编写教材时均存在大篇幅介绍国外译论的倾向,而对国内本土翻译策略与方法着墨较少,国内外内容比重失衡。

近年来,国内已涌现出许多学者提出不同的译论与策略,编者应该重点关注这些成果,取其相对完善、自洽、本土的译论,将其纳入教材内容,充实本土译论,提高其影响力和运用度;同时还要重视传统译论的传承与传播,“传统译论可以借助写得深入浅出的翻译教材得以广泛传播,因为翻译教材的出版、印刷和传播数量通常远远高于专著”“要从教材层面进行更正和创新,要将中国传统译论恰到好处地糅合在翻译教材中,让中国的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恰到好处地扎根于新一代学生译员心中”(陶友兰,2015),培养出具有深厚中华文化底蕴的译者,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话语和叙事体系,“牢牢掌握中国话语国际传播的第一定义权和最终解释权”,服务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对外传播和国家战略需求,加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杜占元,2022)。

2016年,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鉴于此,新时代翻译教材应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学习与英语读写、演讲和翻译能力的培养有机融合,发挥翻译课程的思政育人功能,引导学生系统学习、深入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学会用中国理论观察和分析当代中国的发展与成就,从跨文化视角阐释中国道路和中国智慧,坚定“四个自信”。

4.3 教材内容冗余重复,用语表达拟欠统一

翻译教材的编撰主要包含两部分,分别是理论阐述部分和案例分析部分。翻译教材不仅需要重点描述理论知识,还需要配置相应的翻译实例,以便于教材使

用者领会翻译知识。然而,现阶段国内翻译教材多数相似程度较高,主要表现为仅改变理论知识编排方式或者增删一些理论成果,并未做较大改动;部分教材的翻译案例分析沿用同样或类似的经典案例。教材内容的高度重复不仅会造成出版资源的严重浪费,还阻碍教学研究发展,降低授课质量,不利于翻译人才培养。

同时,在国内翻译教材内容高度相似的背景下,少数编者为避免重复,会改变部分术语表达;也有编者对理论了解不深,对术语表述存在偏差,因而造成国内翻译教材相关专业术语表述混乱。术语运用能力是教材编者不可或缺的能力,面对大量翻译术语,编者往往会因其主观理解而造成术语错用。究其根本,是国内翻译研究术语管理不到位。术语管理包括术语的文件归档、存储、处理与展示(Austermuhl, 2001),指为了满足术语一致的目的而对术语资源与信息进行管理的实践活动(王华树、张政, 2014)。因此,翻译术语管理库的应用显得尤为重要,只有对术语信息进行系统搜集和科学整合,形成高质量、准确、统一的信息共享,提高教材编者的术语理解能力和运用能力,才能有效避免专业术语错用现象。

5 翻译教材建设对策窥探

本文针对国内翻译教材现状与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对应的解决措施建议。翻译教材建设不仅涉及教材编者,还涉及出版行业、高校、专业协会、教育管理部门等不同主体,只有各方重视翻译教材建设问题,形成合力,才能不断推动翻译教材高质量发展。

5.1 重视市场需求,创新教材模式

教材内容编排是决定其整体结构的基础,是教材编者教学理念的物质显化。优质的教材需要编者综合考虑不同需求,权衡利弊后编写适合不同人群的翻译教材。

第一,编者应明确教材的目标人群和专业用途,是面向高职高专生、本科生还是研究生,面向翻译专业学生还是业余爱好者,面向口译还是笔译等。编者通过明确使用对象,综合考虑不同受众的学习需求,可通过问卷调查等形式掌握使用者的知识水平、学习目的等,从而开展教材编排工作。

第二,“翻译教材如果只讲某些领域的翻译技巧,仍然不能认为是与职场无缝对接的教材。”(岳峰, 2017)编者需要对接社会市场需求,对国内翻译市场展开调研,深度把握行业需求,针对市场缺口培养翻译专业人才;同时观察翻译技术信息化和智能化的发展

趋势,增加CAT软件、在线术语库管理平台、基于神经网络的在线翻译平台以及基于虚拟现实技术的线上口译教室等内容,使教材呈现最新行业与技术动态。

第三,编者应对最新理论成果保持敏锐,及时更新理论知识储备与教材内容,用学界最新动态指导翻译实践,培养符合人才培养标准的高质量语言服务者。因此,教材编者应该充分考虑教材使用者的多样性,协调教材内容的传承性与创新性,兼顾理论教学与翻译实践,更新内容编排顺序,使其充分调动使用者的学习积极性,更好地培养高质量翻译人才。

第四,编者需要依托现代科技,创新翻译教材的存续形态,学会利用多媒体工具,更新教材形式,不仅需要编撰纸质版教材,还需要建立电子教材、数据化教案、在线课程、翻译素材库、翻译试题库等配套数据资料,提高教材与教材使用者的交互性,在学习过程中充分调动学习者的不同感官。通过文字、图像、声音等不同信息模式,提高学习者的自主性与积极性,提升学习效率。

总之,编者需要充分更新教材编撰理念,在教材开发过程中需要重点把控教材编写、校对、出版等各个环节,注重教材开发的创新性和实用性。

5.2 强化思政理念,建立监审机制

翻译教材建设问题除了涉及编者外,还涉及其他相关机构。从总体来看,“翻译教材之所以存在着鱼龙混杂现象,原因之一,是缺乏一套完整的、科学的、便于操作的翻译教材评估系统”(曾剑平, 2013)。学界应该高度重视翻译教材的科学化管理,建立客观有效的翻译教材评审机制,制订教材质量衡量标准。完善的教材管理机制能够避免低质量教材的产生,通过规范教材的知识性、实用性、创新性、严谨性、整体性、可读性等方面,辅助产出优质翻译教材。因此,笔者建议应尽快成立翻译教材审查委员会,“在委员会中建立起教材研究、设计、编写、发行、评估为主体的教材研发编审体系,并以教材编写委员会为主导,结合高校、出版机构及社会其他相关部门,一起通力合作,最终在我国形成教材研究—出版发行—投入使用—质量评估—教材研究的循环运作模式”(吴爱俊, 2010)。只有通过科学严谨、公开透明的教材审查流程,才能有效避免内容重复、缺乏新意、机械堆砌、材料过时的低质量翻译教材流入市场,从源头减少低质量教材产生。通过建立有序科学的翻译教材研发体系,从根本上提升翻译研究质量和学术成果水平。

翻译教材建设作为培养翻译人才的基础性工程,在培养具有坚定政治立场和较高政治敏锐度的新时代

复合型翻译人才方面具有重要地位。因此,在发挥课程思政价值方面,翻译教材应在帮助学生提高读写、演讲与翻译能力的同时,帮助其掌握中国特色话语体系,提高用外语讲好中国故事、用中国理论解读中国实践的能力,使其成为有家国情怀、全球视野和专业本领的高素质国际化外语人才,自觉做到坚定“四个自信”,并进一步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思想、理论和情感认同。

5.3 发挥在线翻译数据库功用,促进资源共享

翻译术语是翻译理论的核心关键,建立国内统一科学的术语库有利于高质量教材建设。翻译术语数据库涉及理论知识的梳理、整合和管理等方面,是“互联网+翻译学”相结合的数据工程,“适用于数字化时代知识再现、信息传播、认知思维发展的需要,是知识资源深度管理的工具”(苗菊、宁海霖,2016)。综观国内外最新的翻译理论流派,涌现出不少具有重要学术意义的成果,如结构主义翻译流派、后殖民翻译流派、文化学派、译介学、变译学等,这些创新成果涉及相对庞杂的翻译理论专门术语。翻译理论的不断蓬勃发展决定了翻译术语理解使用的复杂性,为了避免翻译教材术语错用、误用等问题出现,学者、高等院校、教育部门、出版公司等主体应该加强合作,积极与信息技术人才深度合作,加快开发科学统一的翻译术语数据库。“术语知识库是开展知识服务的基础资源”(宋培彦等,2014),在线数据库能够有效提高教材编者获取资源的信度与效率,在共享优质理论资源的基础上,大大提升教材编撰速度,产出符合各方需求的高质量教材。因此,科学统一的翻译术语体系能够有助于解决国内教材术语表述不一、理论知识错用、中英表达偏差等问题,从编撰源头的根本提升翻译教材的整体水平,促进翻译教学质量提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应用价值”(Si *et al.*, 2010)。

6 结语

我国社会经济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对语言服务行业提出了全新的要求与挑战,作为输出高质量双语交流人才的关键环节,翻译教学显得尤为重要。而翻译教材恰恰是翻译人才学习理论知识、习得实践技巧、提高综合素养的核心关键。重视国内翻译教材建设不仅有利于满足社会对高质量双语人才的迫切需求,更能提升本土翻译研究理论水平,加快完善中国翻译话语体系。本文从国内翻译教材的系统梳理入手,基于对翻译教材现状的探析,指出翻译教材研发与翻译教材使用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通过推动翻译教材编撰和

翻译教学活动的互动适应,提倡构建翻译教材审查制度,发挥教材思政育人功能,制定优质翻译教材标准,创立在线共享翻译术语数据库,能够有效推动我国翻译教材建设实践。概而论之,虽然国内翻译学科建设已经取得了一定成绩,仍需不断借鉴其他成熟学科的教材建设经验,及时更新国内外翻译学界的最新学术成果,以期产出满足时代需求的高质量翻译教材。□

参 考 文 献

- [1] Austerlühl, F. *Electronic Tools for Translators* [M].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2001.
- [2] Si, L. E., O'Brien, A. & S. Proberts. Integration of distributed terminology resources to facilitate subject cross-browsing for library portal system [J]. *Aslib Proceedings*, 2010(4).
- [3] 杜占元. 推动国家翻译能力建设,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在中国译协第八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J]. *中国翻译*, 2022(3).
- [4] 方梦之. *中国译学大辞典* [Z].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1.
- [5] 顾明远. *教育大辞典*上 [Z].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8.
- [6] 顾维勇. 析几种商务英语翻译教材及其译例 [J]. *上海翻译*, 2007(1).
- [7] 何刚强. 彰现特色、知行并举——本科翻译专业教材编撰应处理好五个关系 [J]. *上海翻译*, 2013(2).
- [8] 贺爱军, 尤其达. 翻译专业建设的世纪回眸与前景展望——《我国翻译专业建设:问题与对策》述评 [J]. *外语界*, 2009(2).
- [9] 教育部高等学校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英语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南(上):英语类专业教学指南 [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9.
- [10] 李忠霞, 王素雅. 有色冶金应用翻译人才培养探究——评《冶金专业英语》 [J]. *有色金属(冶炼部分)*, 2021(3).
- [11] 廖哲勋, 田慧生. *课程新论* [M].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3.
- [12] 刘季春. 调查与思考——谈建立我国翻译教材的新体系 [J]. *中国翻译*, 2001(4).
- [13] 刘娟. 服装英语的翻译理论与实践应用研究——评《服装英语翻译概论》 [J]. *印染助剂*, 2018(2).
- [14] 苗菊, 宁海霖. 翻译技术的知识体系化演进——以双语术语知识数据库建设与应用为例 [J]. *中国翻译*, 2016(6).
- [15] 苗宁. 翻译教材建设的实然诊断与应然设计 [J]. *中国出版*, 2014(15).
- [16] 单宇, 何苗. 科技翻译教材评价模型与难度量化分析 [J]. *当代外语研究*, 2021(5).

- [17] 宋培彦,王星,李俊莉. 术语知识库的构建与服务研究[J]. 情报理论与实践, 2014(11).
- [18] 孙启勤. 翻译教材改革的讨论[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S1).
- [19] 陶友兰. 翻译传统译论的战略传承与传播:翻译教材建设视角[J]. 上海翻译, 2015(4).
- [20] 陶友兰. 我国翻译教材建设与翻译学学科发展[J]. 上海翻译, 2017(6).
- [21] 王宏,付瑛瑛. 试论典籍英译教材的编写——以本科翻译专业教材《中国典籍英译》为例[J]. 中国外语, 2009(2).
- [22] 王华树,张政. 翻译项目中的术语管理研究[J]. 上海翻译, 2014(4).
- [23] 王华树,刘世界,张成智. 翻译搜索指南[M]. 北京:中译出版社, 2022.
- [24] 吴爱俊. 变译理论带给翻译教材编写者的新启示[J]. 语文学刊(外语教育教学), 2010(4).
- [25] 肖维青,冯庆华.《翻译专业本科教学指南》解读[J]. 外语界, 2019(5).
- [26] 肖维青,赵璧,冯庆华. 推动构建中国特色翻译本科专业人才培养体系——《翻译教学指南》的研制与思考[J]. 中国翻译, 2021(2).
- [27] 岳峰. 职业笔译教材的编写理念与实践[J]. 上海翻译, 2017(6).
- [28] 曾剑平. 英汉翻译教材研究:理论与实践[M]. 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 2013.
- [29] 张成智. 翻译与搜索教程[M].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 2022.
- [30] 张美芳. 探索翻译教材建设,促进翻译专业教育——《我国翻译专业教材建设:理论构建与对策研究》述评[J]. 上海翻译, 2015(2).
- [31] 张巍然. 大学英语翻译教材编写的困境和对策[J]. 出版发行研究, 2018(7).
- [32] 郑艳杰. 翻译教材编写中的方法论[J]. 中国科技翻译, 2013(2).
- [33]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部. 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Z]. 北京: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5.
- [34]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部. 现代汉语词典[Z].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2.
- [35] 仲伟合. 对《普通高等学校本科翻译专业教学指南》的几点看法[J]. 当代外语研究, 2021(5).

基金项目:本文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翻译学研究中心科研招标项目“中美机构性翻译传播与接受比较研究”(项目编号:CTS202208)的阶段性成果。

收稿日期:2022-06

通讯地址:523808 广东省东莞市 东莞理工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龙)
510632 广东省广州市 暨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官)

语言服务与翻译国际传播策略研究论坛 暨《“译学家”翻译教学与实训平台(本科版)》产品发布会

2022年12月27日,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外语教育技术专业委员会联合广东技术师范大学举办的第三季“译学家”报告厅——“语言服务与翻译国际传播策略研究论坛”暨《“译学家”翻译教学与实训平台(本科版)》发布会成功召开。

一、开幕式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副校长许玲教授应邀为大会致欢迎辞。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黄友义教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原校长仲伟合教授和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首任院长柴明颖教授作为特邀专家为本次论坛致开幕辞。

黄友义教授指出高层次翻译需要的六项条件及DTI培养方案和学科建设的规划。仲伟合教授介绍了翻译学科发展的六个阶段、专业人才培养的三个层次、学科的重大背景以及未来翻译学科的发展要求。柴明颖教授回顾了上海市翻译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的发展历程和主要任务。

二、主旨报告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翻译学院研究中心主任赵军峰教授的报告题目为“新时代中国特色法治术语的翻译策略:立格与传意”。他从大的时代背景出发,讲到中国特色法治术语的翻译传播困境、中国特色法治术语的新时代内涵

Reflections on Developing China's Translation Textbooks: Current Situation, Problems, and Solutions

LONG Jingjing¹ & GONG Qi²

(1.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Media, Donggu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Dongguan, Guangdong 523808, China; 2. College of Foreign Studies,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32, China)

Abstract: At present, there are few systematic studie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ranslation textbooks by domestic scholars, and there is a lack of comprehensive reviews and combing of existing translation textbooks.

In this paper, we systematically review and sort out the number of translation textbook outputs and the total number of citations in China since 1900 and summarize the current status of the existing translation textbooks in China, and identify the problems highlighte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ranslation textbooks based on a summary of previous stud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olistic and professional use.

We find that this field is currently facing many real challenges. At present, the translation textbooks in China mainly have the following problems: (1) The content of textbooks is old and outdated, which is out of line with the market demand, and the format of the textbook organization is rigid which can lead to a decline in teaching efficiency and quality, and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cultivation of high-quality translation professionals; (2) The devaluation of indigenous translation theories and insufficient attention to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value of textbooks can lead students to neglect the use and dissemination of translation theories produced in China, which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translation theories. This is not conducive to building students' pride and self-confidence

in local culture and to cultivating translation talents who can "tell the Chinese story well"; (3) Many low-quality textbooks, with a lot of plagiarised content, use distorted or fabricated terminology to reduce repetition, or to avoid censorship, making the terminology inconsistent or even conflicting with each other.

To address the above problems,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following solutions: (1) Pay attention to the actual market demand, innovate the content and form of teaching materials,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ranslated teaching materials to digital and electronic, and expand the presentation form of teaching materials so as to improve students' learning efficiency; (2) Establish a comprehensive censorship and supervision mechanism for teaching materials, give full play to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values of teaching materials, and integrate the curriculum-based political and virtuous awareness into the teaching content and students' learning tasks; (3) Cooperate to develop a unified database of translation terms and promote online sharing of teaching materials resources, which is conducive to enhancing teaching materials compilation and producing high-quality teaching materials that meet a variety of needs. Through the above means, this paper aims to fundamentally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ranslation textbook construction in China.

Key words: Development of Translation Textbooks; Problems; Solutions; Language Service